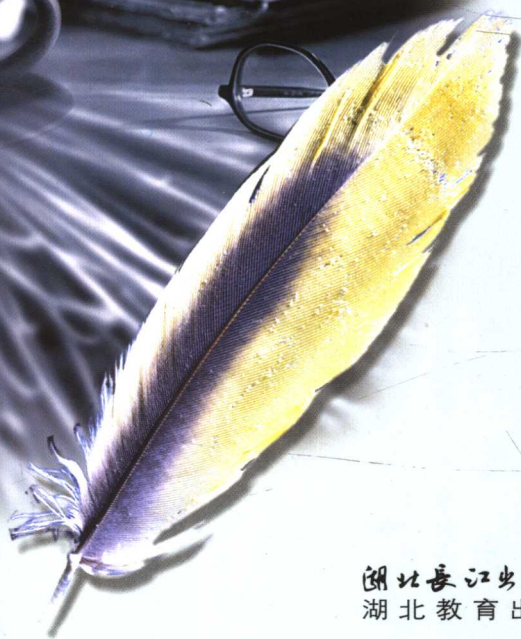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BIBL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任东升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十一)

•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



STUDY ON THE TRADITION OF BIBLE
TRANSLATION INTO CHINESE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任东升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任东升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10

(中华翻译研究丛书第二辑十一)

ISBN 978 - 7 - 5351 - 3867 - 5

I. 圣… II. 任… III. 圣经 - 翻译 - 研究
IV. B971 -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8325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 - 83619605

邮购电话:027 - 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430034 · 武汉市硚口区长丰大道特 6 号)

开 本:850mm × 1168mm 1/32

6 插页 15 印张

版 次: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350 千字

印数:1 - 4 000

ISBN 978 - 7 - 5351 - 3867 - 5

定价:42.8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任东升 1966年生,男,河北井陉人。1988年河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毕业,获学士学位;2002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获硕士学位;2005年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获博士学位。2002—2005年间曾担任美国科学杂志 *Discover* 中文版《科学与生活》首席翻译,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翻译学方向硕士生导师,山东省国外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已在《外语与外语教学》、《上海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外语教学》、《外语研究》等全国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2篇,出版译著4部,主编教材4部。

内 容 提 要

《圣经》具有神学、历史、文学三重性质,是影响近代中国的一百部重要译著之一。圣经汉译活动肇始于唐代,活跃于明清之际,兴旺于清末民初,迄今延续不断,经历了西人(来华传教士、汉学家)主译、西人和中国学者合作翻译、中国翻译家独立翻译三次翻译主体的变换,采用过文言、浅文言、官话、现代汉语四种语体,出版过摘译本、单册本、多册本和全译本。以严复翻译《马可福音》片断为标志,圣经汉译呈现文学化的趋向;以李荣芳用“骚体”翻译《耶利米哀歌》、启用“亚卫”神名译法为标志,圣经汉译出现了多元化局面。中国诗学传统对中国文学翻译家的圣经诗歌翻译具有强大制约作用,中国文人读经传统和现代中国文学认知环境对《圣经》的文学性阐释和接受发挥了重要影响。

略谈经典翻译文化问题 ——《圣经汉译文化研究》序

这本书是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学术专著,作者是任东升。我是在南开大学认识他的。第一次是刘士聪老师让我到南开外语学院给他们的师生讲方法论和翻译理论研究,东升当时是翻译方向的硕士,他来听我演讲并陪我游览校园,我第一次认识了他。第二次(2002年10月25—27日)还是刘老师让我去南开在他们举办的《红楼梦》翻译研讨会上讲讲经典作品的翻译研究与翻译批评问题。我知道东升已被保送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圣经》的翻译问题,由崔永禄老师指导。他研究《圣经》翻译,跟崔老师不无关系,他的硕士论文《圣经汉译的文学化趋向》也是崔老师指导的。这次开会他奉命专程进京请来了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此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我看到了他的交往与做事的能力。我从南开回到青岛后不久收到东升11月21日寄来的照片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除评论翻译界现状和诉说听我演讲的感受之外,还讲了他的兴趣爱好和志向。他说:“我是一个崇尚学术自由的人,一不想做官,二不想攒钱。大学时代我写诗,弹吉他,现在异地求学,居然喜欢上了《圣经》研究。”信中还有一首为我题像的诗,现抄录下来,以展现东升的诗才:

蓬莱临海见日影，	译坛学术多盛事，
崂山路远道可闻。	君以才德聚人心；
黄卷青灯两度去，	衣带渐宽铁肩在，
草堂僻壤育仙茗。	留得华章泽后生。

任东升 壬午冬日

后来他曾在电话上就博士论文写作提纲征求我的意见，我提议要注意理论的开拓性和系统性，要构思成一本学术专著的逻辑架构；还要注意材料的可靠、丰富、系统。2005年暑期他在南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来到中国海洋大学外语学院任教，因此接触的机会就多了。他多次说到我的一篇短文《关键在于追求什么》（见《外国语》1995年第6期）使他走上追求学术的道路，那时他还在张家口任教。现在他的博士论文经过沉淀、修改、充实就要出版了，让我读后赐序文一篇。这是我学习和跟东升交流的极好机会，所以我就欣然从命了。我读后感到这是一本有开拓性的专著，因为在中国翻译研究领域还未见到这样全面系统研究圣经汉译文化的著作。其主要价值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理论与方法上的重要价值。从书名看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既有对《圣经》的研究，又有对翻译的研究，还有把翻译作为文化的研究，而且要把前两个内容都要有机地纳入后一个内容的系统，这就更不容易做好。东升抓住了这个复杂系统的核心范畴“翻译文化”，在继承别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了它：“指人类通过从事翻译实践和对翻译现象的理论思维所创造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反映这些创造过程和手段的机制与心态。”并把它分化为翻译实务、理论研究、产品影响3个二级系统及其9个三级系统。然后水到渠成

地就厘定了“翻译文化研究”的内涵：“就是对翻译实务、翻译理论以及对两者产品之影响的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以圣经汉译为核心的研究系统。这种厘定与分化范畴的方法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特别是面对错综复杂的课题，要建立研究的逻辑系统，更有其重要价值。这种方法是我们的学术传统所缺乏的，比如关于“信、达、雅”的论争、直译与意译以及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大都是不界定，不分化，也不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无意识建立分级的范畴系统。因此时间与精力耗费得难以计算，但对翻译学理论系统的建设却没做出有多大价值的贡献。

2. 资料建设的重要价值。一个新课题的研究最重要的不仅是新范畴的创建或对旧范畴的改造或者新命题的提出，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材料的收集和整理。这是基础工程，对现在和将来都有奠基作用，我们决不可低估这项工作的价值。这使我想起丁声树先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释否定词“弗”“不”》的事。他详尽地收集先秦典籍中的资料，充分论证了这两个同义否定词的区别。“这篇论文资料丰富，论证科学而严密，见解新颖精辟，使整个学术界大为震动，丁声树也因此一举成名，当时他还不满 25 岁。”（见中国社科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 年，第 496 页）钱钟书先生的名篇《林纾的翻译》在《七缀集》中正文 26 页半，注就 70 条，占 12 页半，足见资料的丰富。资料工作最主要的要求有两条，一条是考辨真伪，另一条是全面而系统。这是学术研究中考验研究者素质与水平的工夫活。我们学外语的人大部分由于没受过田野工作与文献学的训练，所以这方面的工夫都很欠缺。东升在资料的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绩。（1）他下功夫做了许多查实与考证工作，有关于历史的（包括圣经的翻译与传播），有关于宗教的，有关于《圣经》原文版本和译文版本的，有关于圣经

语言和译文语言的,还有关于各类译者和圣经译文影像的,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都集中在全书的大量注释中。(2)中、英文各类文献的收集比较全面而系统。我看的原书稿中直接和间接引用的参考文献多达400余种(成书时有删减),这些文献包括十多个种类,涉及:①《圣经》中、英文译本;②圣经汉译研究文献;③圣经翻译研究文献;④圣经评断学与圣经文学;⑤宗教史与基督教文化;⑥翻译研究论文;⑦翻译研究专著和辞书;⑧比较文学文献;⑨文学作品;⑩其他文献。此外还有《圣经》汉译史和《圣经》西方翻译史两个“大事记”,也都是很有价值的史料。

除了以上这两条以外,书中还有关于各类译者的研究、“动态对等”的研究、《圣经》和佛经汉译的比较研究、圣经和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关系研究等,这些部分也都有作者新的发现和自己的见解,读者读后会自有评价,我就不一一评述了。

读完了书稿,掩卷深思,还有几个问题想说说自己现在的一些看法。

1. 关于《圣经》的研究问题。《圣经》是对人类有极大影响的宗教经典,读者之多,发行量之大,翻译语种之多,我想可能都是世界之最,“到1984年底,共有1808种语文的全译或节译的《圣经》译本”。(见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第36—37页)。记得李赋宁先生说过,要学好西洋语言文学必须学习《圣经》(the Bible)、文艺复兴(the Renaissance)和希腊与罗马神话(Greek mythology and Roman mythology)。《圣经》为先,因为《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源头。西方有一门学科叫 biblical criticism,专门研究《圣经》的版本、编纂和历史问题。我读过《圣经》,英文本是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翻译、Collins 1976 年出版的 *Good News*

Bible(in Today's English Version);汉语本是中国基督教协会推出、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1998年承印的简化字“神版”和合本。我还读过张久宣翻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出版的《圣经后典》。我翻译E. 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时,核查过福斯特引用的《圣经》中的一些言语。我总体感觉《圣经》的写法主要是叙事、描写和抒情,文体多种,《旧约》分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先知书”;《新约》分为“四福音”、“教会历史”、“书信”和“约翰的启示”。都没有严格的逻辑论证,就是充满哲理的《约伯记》、《箴言》与《传道书》,也都是文艺体裁。《旧约》主张武力抗争,血洗仇敌,《后典》与之一脉相承;《新约》主张博爱,所以《圣经》从内容到形式都充满了矛盾,算不上典型的哲学著作,但是它包含很多哲学问题和哲学思想,比如“上帝的存在、宇宙的产生、神的权力和人的自由、神的律令和道德责任、善与恶、神对世界的干预,等等”(见傅有德《希伯来〈圣经〉哲学思想初谈》,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93—101页)。这些问题不仅是犹太人神学与哲学的源头,也是西方世界神学与哲学的源头。研究《圣经》不能不研究这些重大问题。凡经典都可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圣经》至少可以有哲学的、神学的、宗教的、史学的、文学的、翻译学的以及传播学的等多学科的研究。

2. 有关人类文化的研究问题。哲学、宗教、科学、文学(艺术)四者有复杂的关系,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如何对待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哲学永远是母体,能产生许多学科,因为它有无穷尽的问题,又永不满足现状,追求无止境地探索。它最关心世界的前途与人类的命运,但跟宗教不同,它不信仰上帝,而信仰理性。宗教是一种被确定了的信仰,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神(上帝)。周国平说:“哲学面向宗教,敢思科学之不思,又立足科学,敢疑宗教之不疑,正是这一结合了两种对立因素的品格使

之成为比科学和宗教更加伟大的东西。”(见《人生哲思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第349页)哲学的性质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个问题永无确定的答案。哲学和文学的本源是神话，后来分离出来各自独立了，“艺术用审美净化性的烦恼，哲学用智慧净化死的恐惧”，“一般人追求可望也可即的东西，诗人追求可望不可即的东西，哲学家追求不可望也不可即的东西”(同上书第350—351页)。2004年10月12日在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科学·人文·未来”论坛上，我向哲学家成中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宗教和科学打仗，永远是宗教胜利；而文学和科学打仗，永远是科学胜利，而且这仗是永远打不完的。请问宗教、哲学与文学三者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成中英给予了这样的回答：

西方的宗教有这样一个特点，科学越发展，宗教就越要超越。西方的宗教成为一种超越的力量，因为它知道，科学考虑的是自然的事物，是有限的时间、空间的事物，但人类往往追求一种无限的东西，对生与死有终极的关怀。科学家理解这个情形，把它看成是一种感情，一种感性、想像、知觉，不需要与之抗争。这是西方宗教何以仍然有其力量的原因。文学作为表述生活的方式，必须面对生活，而且要直接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文学家可以直接发挥，为人们带来很多兴奋与紧张，也带来放松与欣慰。科学与哲学的冲突，文学与宗教的矛盾，都是发展与创新的源泉，也为我们的文化带来很多想不到的收获和成就。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些冲突呢。(见王蒙 管华诗主编《高山流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47—248页)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研究与处理各种冲突与矛盾的历史,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分别记录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神、人自身的灵与肉的冲突与矛盾以及人类研究处理这些冲突与矛盾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教训未经理论加工与艺术升华的形态就是社会心理文化,经过系统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形态就分别进入了基层意识形态(政治理论、法权观念等)和高层意识形态(哲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社会心理文化也称为俗文化,基层与高层意识形态合称社会意识形态,也叫雅文化。这是两种社会文化共存的基本形态,缺一不可。“一般说,高层文化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当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只是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影响,它们往往为高层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带来民间气息,注入新鲜活泼的生命和活力。”(见王元化《集外旧文钞》,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75页)但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由于“工具理性”(实际就是“金钱理性”)过分张扬,高层文化(实际就是“价值理性”)的导向作用严重萎缩,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快速向低俗化、物质化、动物化方向发展,以致让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大学者大为震惊:“仅仅前后不过十年(指1994—2004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么迅速。”林毓生给王先生回信说:

目前塑造年轻人“[无]意识”与“[无]品位”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各国制度尽管不同,许多年轻人趋向享乐,趋向低俗的情况,大同小异。我本来以为欧洲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对于人性物质化及动物化的侵蚀,应该比较能有较大的抗拒力。但,事实不然。欧洲文明世俗化、物质化与动物

化的程度,有些地方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见王元化 林毓生《关于文明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5—209页)

面对这样的问题,王先生“是于心难堪此劫”,林先生是“心情甚为沮丧”。这充分体现了人文学者关怀人类终极命运的崇高境界。那么怎么办呢?首先不能悲观失望,文化这个“三化”的过程不可能是永久的,但到底要多久?现在还无人能回答。不过我们应该相信人类会在这个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自我调节。其次要寄希望于人类新型的精英,他们有良知有智慧有能力举起新文化的大旗,推动政府和媒体来调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使失却的“价值理性”回复到适当的地位并有新的发展,从而使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3. 经典翻译文化研究问题。本文题目说的“经典翻译文化”,其内涵是指把经典作品的翻译作为人类文化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来研究的文化。翻译经典作品首先要研究作品,同时一定要研究和继承别人对作品研究的成果,前面说的《圣经》研究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这既是翻译的基础,也是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基础。翻译《红楼梦》,如果不研究与继承红学家的研究成果,怎么能体现翻译的高水平?同理,怎么能体现《红楼梦》翻译文化研究的高水平?翻译文化既然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应该把这种研究置于整个文化大系统中进行,要十分关注整体与部分的互动关系,前面说的人类文化研究就是从这方面讲的。研究《圣经》的翻译文化,如果不研究和继承圣经文化和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怎么能体现这种研究的新水平?经典翻译文化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领域,那就是多元的比较研究,除经典本身的比较研究以外,还有多学科的比较研

究,比如《圣经》和《可兰经》的哲学、神学、史学、文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比较研究。目前国内的汉语典籍外译出现了发展的势头,参与的人在逐渐增加。但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上述这些问题,概括一句话就是:一定要把经典翻译作为一种多元性研究来做。经典翻译文化的研究尚须大力倡导,希望今后能有较好较快的发展。

杨自俭

2007年5月15日

记于青岛浮山麓静远斋

翻译依然神圣

——序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国庆长假,已毕业的博士任东升从海洋边打来电话,一是照例问候老师,一是恳请为他的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写一篇序言。想起和东升这一届南开博士那些一起相处的难忘的日子,和他们一张张洋溢着青春朝气的学子的笑脸,我欣然答应了。

接着收到了东升寄来的书稿,我发现已经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动,俨然是一部专著的模样了。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标题上增加了“文化”二字,而在正文的第一章则专门论述了翻译文化和翻译文化史的概念。其中引述了王克非教授的观点:

翻译文化史应视为文化史的一部分。翻译文化史研究实质上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

我也很赞同“相对于过去的翻译研究,翻译文化史研究提

供了一个新的扩大的视角”的观点,只是其中的罗列漏掉了至关重要的“宗教”一词。这使我想到了《圣经》以及《圣经》翻译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是《圣经》的地位问题。作为历史、神学和文学三个方面相综合的文化典籍,《圣经》在西方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基于这样的学术信念,我在前几年编著的《世界名作汉译选析》中将《圣经》的翻译列在了开篇的首要位置,并提出《圣经》文体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东升知道我也对《圣经》感兴趣并且还比较重视的一个学术契机。

一是《圣经》在西方翻译史上不断被翻译和重译的问题,说明了《圣经》翻译在西方文化经典的翻译中一直居于核心和源头的地位。于是,在有一年的博士专业考题中,我出了这样一道题:让考生以《圣经》翻译为例,说明翻译文化史上一再出现的定本和不定本的相对关系,其目的无非是想让考生能够借助扎实的史实介入关于定本的理论问题的深刻反思。

然而,《圣经》翻译的研究却始终是一个误区甚至禁区,和国外及国际上的《圣经》翻译和《圣经》研究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我们都无法相比,而和港台澳相比,大陆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关于研究成果的具体的数字比较,东升的专著里已有,恕不赘言。单就《圣经》的翻译与研究之难而言,以及成果的出版与发表之难而言,自然有其方方面面的原因,但追根溯源,则难免涉及到对于宗教的理解和对待上。一种常见的认识,就是不加辨别地把宗教和迷信画等号,以至于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领域。中国文化的世俗化倾向姑且不论,假如我们依据康德关于知识和信仰的划分,就可以把这一问题澄清在科学认识的常识内。

回到翻译文化史,而且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宗教毕竟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术上,是既不能回避,

也不容易搞得明白的。于是,下面一种近乎文学的描述也许是适当的:

宗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方面。宗教这朵不结果实的精神花朵,盛开在形上思维与神话想象嫁接而成的高枝上。它远离生活的坚实土壤,伸向虚幻无垠的天空,沐浴着高渺的信仰之光,吸取着圣洁的希望之露,不仅开得早,而且久盛不衰。(《世界名作汉译选析》,王宏印 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然而,作为学问,无论是宏观而全面地研究宗教现象的宗教学,还是侧重宗教经典和原理、信仰注重论证的神学,毫无疑问都是人类文化知识的一部分,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古代的学问中,神学往往和哲学不分家,而且属于哲学,这一事实使得人们对于宗教有一种敬而远之的畏惧感或敬畏感——如同孔夫子对于天命的敬畏一样。可能正由于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按照学问的分类和研究的对象相联系的精神,提出了“任何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著名论断。他的论证是这样的:

因为最神圣的学术也是最光荣的,这学术必然在两方面均属光荣。于神最合适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正如此……所有其他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比哲学为更佳。(《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 著,吴寿彭 译,转引自《世界名作汉译选析》,王宏印 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